

川大史学·任乃强卷

任乃强

卷

任乃强 著
任新建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 川大史学 ·

任乃强 

任乃强 著 任新建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庄 剑 任新建(特邀)
责任校对:曹玲玲(特邀) 吴雨时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任乃强卷 / 任乃强著; 任新建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14-3492-8


I. 川... II. ①任... ②任... III. ①史学-文集
②史学-中国-文集 IV. K0-53②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8639 号

书名 川大史学·任乃强卷

作 者 任乃强著 任新建编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24.875
字 数 58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1 500 册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www.scupress.com.cn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冉光荣 石 硕 孙锦泉 刘复生
任新建 何一民 何 平 罗志田 陈廷湘
杨天宏 徐亮工 郭 齐 彭裕商 舒大刚
蔡崇榜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 长：王挺之

副组长：孙锦泉、舒大刚（常务）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应平 孙锦泉 李德英 陈廷湘
杨秀春 徐开来 舒大刚 鲍成志 霍 巍

秘 书：辛 旭

序

历史学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也是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在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中，即要求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与经学、词章并列，1918年改名为历史科。1924年国立成都大学正式组建了史学系，是川大历史上最早设立的10个系之一。

百余年来，张森楷、何鲁之、刘掞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澂、丁山、陈衡哲、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吴天墀、胡鉴民、任乃强、杨人楩、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闻宥、常乃德、钱穆、缪钺、蒙思明、萧公权、卢剑波、谭英华、萧一山、吴廷璆、杨东莼、周传儒、柳诒徵、韩儒林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先后在此设帐授学，为川大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术繁荣的基础是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融会。回顾川大的史学发展史，至少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首先是近代“蜀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史之学”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在川大史学系任教的近代蜀学传人包括张森楷、叶秉诚、祝同曾、蒙文通等，在史学系之外则有龚道耕、刘咸炘、庞石帚等。在治学取向上，他们多重视古经、正史等基本典籍的训练，崇尚博通的治学取向，留意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新史学重视新材料扩充、重视问题意识等取向不

无距离。不过，这些学人也多少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又随个人和时代不同）。

其次是一批基本为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学人，包括何鲁之、刘棻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澂等。他们或是留学生（多为留法者），或在国内受到较为完整的史学训练（多出自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他们之中不少人热衷于引介欧、美史学新理论，如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强调过去与现在并非渺不相涉，不主张将历史事实做孤立考察，而更注重其连贯性；同时，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对“问题”的解决，而尤其体现为对现实的启示意义。用何鲁之的话说，就是侧重“史学智识”，而非“历史整理”。

上述两批学者在文化态度、史学意义的认知上都颇有同调之处，与其时在国内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史学有着较大差异。他们的学术取向对后者不无纠偏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大史学的影响力。

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对史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川大史学灌注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了川大史学地位的迅速提升。

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是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徐中舒的一手培养下，古文字学和先秦史在川大生根结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地位。在考古学方面，田野调查与发掘之风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汉骥的提议和领导下，川大史学系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文物调查、三星堆、汶川石棺墓和前蜀王建墓的发掘等多项工作。

在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30年代末，冯汉骥两次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40年代初，胡鉴民对羌族、苗族等民族进行了调查。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

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0年代初，川大史地系表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各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随着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学者先后加入到巴蜀史的研究中，这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并形成川大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同年，蒙文通也发表了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提出了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任乃强转入民族学，也是由地理起步。1941年，史学系正式改名史地系。虽然1947年史、地系分家，但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取向则一直延续至今。

就学术建制而言，今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学科。华大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有独到之长，学术风格更近于主流派新史家。

华大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其中，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大学博物馆等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另外，跨学科研究、注重边缘和底层文化均是其特征之一。

华大历史学科早期的领导者主要是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等外国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开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由李安宅负实际责任，研究所成员有郑象铤、任乃强、于式玉等。由于成绩突出，仅仅成立一两年的时间，研究所就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1943年年鉴》。1941年，博物馆馆长一职由郑德坤接任。他与林名均、梁钊韬、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学者一道，继续推进博物馆建设，组织考古发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拉开序幕。华大历史学科全部并入川大，奠定了此后五十多年直到今天川大史学的基本格局。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下，川大史学研究形成了既注重新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实地调研，又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注重专业化的“问题意识”，又注重“通识”眼光的学术特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古文字学、地方史、考古学、民族史、西南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等传统优势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1981年颁布的首批博士点中，川大历史系就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两个专业入选。与此同时，一批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现代

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城市史、世界上古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也逐渐得到开拓，有的已跃居国内学界之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被授予“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0年）、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2001），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06年是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总结100多年来的办学与科研成就，推动学术的新发展，在学校的统筹规划下，我们特决定出版一套15卷本的《川大史学》丛书，分为“大师卷”和“专业卷”两个序列。“大师卷”中收录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六位先生的著作，代表了川大史学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应该说，长期在川大历史系工作而成就足以当得上“大师”之名的不止这六位先生，但这次由于时间仓促，不及为他们一一编辑专集，希望以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专业卷”按照二级（或三级）学科分卷，尽可能地收录在川大工作过的学者的论文。其中既有已经享誉学界的名家，也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因此，文章的质量必定各有高下、参差不齐，但对于每一个曾经和正在为川大史学的建设付出热情与心血的学者，能够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应该说也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历史文化学院

2006. 7

前 言

任乃强先生是我国现代藏学的开拓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1946年起任四川大学教授。1989年3月30日逝世，享年96岁。

任乃强字筱庄，四川南充县人，1894年农历三月初一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堂本科（今北京农业大学）。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后得全国声援，获释复学。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旋返川，协助张澜先生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南充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28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又名《乡土史讲义》）。

1929年，首次赴西康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等11县。餐风宿露，步行千里，“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至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获得大量资料，相继撰成《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

为冲破民族隔阂和语言障碍，在这次考察中，与藏族女子罗哲情错结婚。在她的帮助下，自1932年起陆续撰成《西康图经》

之《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此书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的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1933年应张澜先生之邀，赴广西等地考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南方民族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返川后相继任重庆大学教授、省三中校长等职。

1936年西康建省后，被推荐为建省委员，再次入康。继续完成了对西康各县之考察。1940年任西康省通志馆筹备主任，为撰修第一部《西康省通志》殚精竭虑，广集博征，做了大量工作，撰有《西康通志纲要》一卷。这一时期，他遍阅康区旧档和珍藏之藏文秘籍，广泛采集康藏民族资料，撰成《康藏史地大纲》，校注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等书，并发表《吐蕃丛考》等数十篇论文和《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主持发掘了王晖石棺等重要文物，撰写了《樊敏碑考》。

他长期潜心致志于康藏地图之测绘研究工作，历时十五年，以自己步测手绘所得，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不仅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并在解放西藏时被作为进军用图之蓝本。

1943年受华西协合大学之聘，任教授兼华西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次年，率华大考察团再次赴康藏地区考察，着重对德格等地寺庙和土司进行了研究。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对元以来康区土司制度的演变及喇嘛教之发展，做了深刻剖析，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1946年，任乃强转任四川大学教授，为推动国内的藏学研究，他联合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起组织了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创办

《康藏研究月刊》，担任主编。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团结藏、汉学者，支持刊物的出版，一直坚持到1949年9月，共出刊29期，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的译作，开创了藏汉学者联合进行藏学研究的范例，成为我国藏学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1950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言献策，他的不少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为解决进军西藏缺乏地图问题，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务院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了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此后，由于“左”的错误，他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即使在被错划为“右派”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仍未间断研究工作，相继完成了《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说》等多部专著。尤其是1960年撰成了近150万字的鸿篇巨著——《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积40年研究之心得，对晋代常璩所撰的中国第一部方志《华阳国志》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和系统地考证，论述了大西南地区上古至东晋时期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探讨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驳斥了前人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1987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先生的冤案得到平反，年已耄耋的他，以超人的精力，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民族史》、《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周诗新论》等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他还以多年心得，写成《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为开发康藏资源做出了贡献。为了培养中青年研究人员，他不遗余力，年逾九十，仍亲为研究生授课，远赴各地县指导修志工作。直到去世前，一直笔耕不辍。

二

任乃强先生治学，以深厚的国学功底为基础，由农学研究而入地理学研究，由地理学研究而入历史学与民族学研究，穿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厚积薄发，视野开远，独树一帜，一生共撰有专著 25 部，发表论文 300 余篇，在多个领域内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藏学研究是任乃强毕生致力的一個学术研究领域。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他在康藏史地、民族、宗教、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研究，发表了《西康诡异录》、《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德格土司世谱》、《吐蕃音义考》等大量论著，驳斥了前人和国外的众多谬论，创立了许多新说，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对我国“边疆学”的兴起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我国现代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一代宗师。

任乃强先生在历史地理方面造诣深厚，于西南史地研究有不少卓绝的贡献：1928 年他发表的《四川史地》，是近代第一部研究巴蜀史地之专著，曾被多所大学作为教材。在《西康图经》的〈境域篇〉、〈地文篇〉两卷中，他首次运用现代地学全面地对西康的历史地理作了科学地研究考证，澄清了长期笼罩在康藏史地上的许多迷雾和谬论；他撰写的《华阳国志校补注》和《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四川上古史新探》、《山海经新探》、《吐蕃传地名考释》、《四川地名考释》、《泸定考察记》等著作，对大西南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历史经济地理以及相关问題作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在学术上有不少创新。提出的许多新颖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民族研究方面，任先生研究独到，成果丰硕，所撰《羌族源流探索》首次对氐羌系民族的渊源与流变进行了整体研究，提出了羌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根的观点。他在《达布人族源问题》、《四川十六区民族分布》、《天全土司世系考》等中，以对个案的考证，深入剖析和阐释了氐羌系民族在西南地区的演变史。

此外，任乃强先生还是我国“格学”（国际上“格萨尔学”的简称）的奠基者，他最早将《格萨尔》史诗汉译推介于国内。他关于《格萨尔》产生年代、人物原型的论断和对史诗版本、内容和艺术价值、民间影响等的研究，为国内《格萨尔》研究打下了基础，在国际“格学”界拥有重要影响；他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编撰《中国农业史》之人，1949年他在四川大学首开“中国农业史”课程；他使用现代圆锥投影、经纬度定位、汉藏英三种文字对照，绘制成了我国第一张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和十万分之一西康分县地图，填补了我国地学上的一项重大空白；任乃强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30年起先后任重庆大学等多所院校教授。他1934年提出的“四川教育改革方案”，首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培养实用人才的教育方针，曾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引起了全川教育大讨论。

任乃强先生在学术思想上，主张“经世致用”，痛恶经学家、道学家的空谈矫说。早年他受“以农立国”思想的影响，专攻农业经济。后来，因“痛感列强对藏覬觐，而国人向对藏事扞隔”之情况，又投身于康藏问题之研究。当30年代，国民政府为是否西康建省而犹豫不决之时，他及时地写出了《西康图经·境域篇》等作，详细地分析了康区的境域变迁、川藏关系，论证了西康建省的条件，促成了西康省的建立；他针对康区人民不堪乌拉差徭之苦的情况，提出“牧站联营”的办法，以解决康藏运输问题；他针对康区社会的特点，深入研究喇嘛教与康藏政治的关

系，提出了“治康首在利导其教”的卓见。

坚定地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藏汉民族团结，是任先生始终坚持的学术立场。他毕生在康藏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藏族同胞真挚的感情。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之时，他先后发表了《致黄专使的信》、《本年西藏政变始末》、《检讨最近之藏区》等文，揭露“西藏问题”真相，抨击分裂活动；解放西藏时，他尽平生之学，积极为进军西藏献策，无偿地捐献出他数十年心血所绘的地图，为解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观点，早在30年代初就提出了康人有“四大美德”之说，批驳了那些视康区为“蛮荒”的错误，大力将藏族优秀文化介绍于国内外。他一生一直保持着对康藏的深深眷恋，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学识奉献给康藏地区的发展，与藏族人民谋利益。

在治学方法上，任先生奉行理论与实证统一，文献与田野调查的互证，时间与空间的参印。他认为从单一的学科领域来研究复杂社会事物，势必有限性，尤其是在像康藏这样史志资料缺乏、社会环境封闭的民族地区，即使前人有所著述，也难免有粗疏不实，以讹传讹之处。必须依靠第一手的亲身调查资料来予以补充和印证，才能达到研究的深度。他在历史的研究中引入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用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相结合来进行研究；他还特别注重地理环境对民族、历史的作用，采用史、地参证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故任先生之作，往往左图右史，鞭辟入里，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风格。依靠这种治学方法，任先生解决了许多历史疑难问题，例如发现西汉水的两源问题，考证出古代民族大多聚落于盐池、盐泉地区，辨清东、西女国的地望问题和附国非吐蕃问题等等。

求真务实，敢于修正，勇于创新，是任先生令人敬佩的治学

精神。他治学从不迷信权威，不囿于成说。总是力求其真。例如他依据实证，批驳康熙的“三危说”，纠正了傅华封关于康藏卫划分的错误、钱穆等关于三苗析支的错谬、胡吉庐等人关于折多山的谬说，辨证了岑仲勉关于附国即吐蕃之错误。同时，他不文过饰非，对自己的早期的错误观点也敢于修正，并不因这些观点已获学界认可而掩饰。正是基于这种治学态度，任先生在其漫长的学术历程中，一直保持着创新的精神，即使在他晚年，仍写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三

本文集根据任乃强先生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成就，选编了任乃强先生的部分研究成果，分为史地、民族、其他三大类进行编排。所收之文，包括专著（节录）和论文两部分，基本上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序。对发表时排印错漏和不清之处，编辑时根据任乃强先生遗存之手稿进行了订正和补充。需要说明的是，任乃强先生著作等身，涉猎广泛，本文集辑录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对于任乃强先生的学术成就，难免挂一漏万。在选编时，我们主要侧重于反映任乃强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学术特点的概貌，因此，收录了部分过去鲜为人知的文章如《芦山汉石图考》、《周诗新诠》等。这些文章尽管不是任先生的代表作，但或在当时引起过较大反响，或别有新意，略见特点。

本文集由任乃强先生之子任新建教授主编，参加资料收集和编校的有四川社科院何洁、英珍、岳小国、陈运旗等。

编者

2006年7月

目 录

历史类

- 康藏名称及境域之变迁····· (3)
- 西康江河异名考····· (17)
- 芦山新出汉石图考····· (32)
- 樊敏碑考略····· (71)
- 张献忠屠蜀辨····· (86)
- 庄跻入滇考····· (120)
- 蜀枸酱入番禺考····· (125)
- 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 (138)
- 我国黄金铸币的历史考察····· (149)
- 蚕丛考····· (160)
- 四川地名考释····· (170)
- 国亡后的蜀民····· (270)
- 说盐····· (304)
- 四川州县建置沿革考····· (327)

民族类

- 泸定考察记····· (377)
- 文成公主下嫁考····· (506)
- “藏三国”的初步介绍····· (521)
- 德格土司世谱····· (537)